

强制企业捐款 权力可视需要扩张?

■今日视点

为低收入群体代言是政协委员的分内之事,但这样的分内之事,有时候却也会做得让人提心吊胆,比如说许家印委员“强制企业捐款扶贫”的建议。

3月4日的《西安晚报》报道,一名身为知名地产商的全国政协委员建议设立“低收入家庭扶助基金”,强制有利润的企业每年捐赠一定比例的利润注入基金,用于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困难。“利润多则多捐,利润少则少捐”,在非常时期实施3-5年,既不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又可起到临危助困、减轻政府负担的作用。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建议居然还赢得了相当的掌声。有网友认为,身为地产商而能超越界别意识为穷人代言,很不容易。还有人说,既然企业享受了政府非常时期的优惠政策,就应该多尽点责任,暂时的强制捐款并没有什么不对。更多人的则认为,许家印的出发点是好的。

老实说,我对“强制”这

个词一直有着相当深的警惕,除非于法有据,否则的话,“强制”往往就代表着权力的滥用和越权。一个常识是,对于权力来说,“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可为”,很明显,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政府可以强制企业捐款,即便是共抗金融危机非常时期,即便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扶企业渡过难关的优惠政策,强制捐款也没有任何理由。捐款,从来都是自愿的,如果硬要强制,那还不如说“摊派”来得更合适。临危助困当然不错,但说到底,这都是政府该做的事,没有任何理由摊派到企业头上,更没有任何理由强制企业“帮助政府减轻负担”。如果真的设立了“低收入家庭扶助基金”,政府也只能倡导企业捐款,而没有权力强行把企业的一部分利润划拨到基金中来。即便是做好事,权力要谨守边界,而不应该动不动就“事急从权”,否则的话,权力一旦没有边界,可以随意扩张,这个社会就乱了套。今天它可以强制企业捐款,明天它就可以把一场演唱会的门票

摊派给教师们。

有很多人认为,“强制企业捐款”的建议虽然雷人,但却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所以根本就不必要当回事。我觉得他们过于乐观了,事实上,权力以各种名义开展“强捐”的事情并不少见,而这些强捐,都会打着“为民谋福利”、“促经济发展”等貌似不容置疑的旗号。“强制企业捐款”的建议只是“权力可视需要扩张”这一惯性思维的延续而已,你要说绝对不会有地方政府在政绩焦虑下“积极响应”,我实在不敢相信。

市场经济改革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我们逐渐懂得了约束行政权力的重要性,“权力要谨守边界,只做能做的事”,是一个艰难而成的共识。但很明显,从强制企业捐款这样的建议和并不零落的掌声来看,权力的边界并不是人人都能分得那么清楚的,一不小心,“权力可视需要扩张”这一让,我们吃够了苦头的惯性思维,又会猛地跳出来咬我们一口。

(本报评论员 赵勇)

五一长假 为民意反复,值!

■热点纵论

恢复五一黄金周的话题成为两会热点。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刘晓明表示,国家旅游局从来没有研究过恢复五一长假的相关事宜。如果地方政府认为恢复五一长假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可以试点。

(3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与其允许地方各自试点,不如全面恢复五一长假。一方面,地方政府几乎都有恢复的愿望,与其架空国家法规,不如重新修改法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各自试点的话,势必局面混乱,影响效果。

根据权限,只有国务院才有权法定节假日。去年刚取消五一长假今年又恢复的话,无疑给人一种朝令夕改、决策不谨慎的印象。但现在的的环境毕竟不同于取消之初,灵活应对当前的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才是上上之策。

在有些人眼里,法定假日出现反复,似乎显得制度不够严肃。但在我看来,政策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为公共利益而反复,并不影响政策的严肃性。当公共利益需要政策做出调整时,反复现象不仅不会被指责,反而能得到广泛支持。其实,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制度反复的现象并不少见,比如,二套房政策一会儿紧一会儿松。

判断一项制度反复到底合理不合理,关键要看是为少数人考虑还是为多数人着想,或者说,是为公共利益还是为部门利益。很显然,网调显示九成人支持恢复五一长假,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五一长假是为公共利益而反复的,也就是说合理的。

五一长假能否全面恢复,关键在于代表委员们能否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既要反映民众的心声,又要罗列恢复的种种理由,以便积聚更多的力量推动相关部门下定决心恢复五一长假。

(冯海宁)

印花税不是股市的油门与刹车

■公民发言

素有“两会十大言者”之称的人大代表范谊建议尽快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他认为这有两大好处,一是在股市刚刚开始活跃时压一压它;二是可以增加国家税收。

很难想象,2008年两会提议降低印花税的也是范谊代表。去年建议下调的理由还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视频,他认为过高的印花税构成过高的交易成本,政府应该尽快下调印花税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如果去年建议下调的理由没忘记的话,今年的建议依然是降低而不是上调。“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政策没变,股市更为低迷时百姓更加应该得到实惠,去年不能作为收钱手段,今年更不应该。那么何

以去年股指4300点时建议下调印花税,今年2200点时却易道而行建议上调?

有一点是说对了,现在上调印花税不会对股市上升造成致命打击,股市从最高点6100点到最低的1660点一路走下来,腰斩再腰斩,已没什么再可称得上致命打击。可是,能不能不再用印花税的调来调去折腾股市?

去年两会建议下调,今年两会建议上调,明年两会呢?调过来调过去,俨然把股市当巴士,印花税就是油门与刹车,想让股指上就踩油门,想让股指下就踩刹车,都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玩股市也如玩开车。开车的当然充满成就感,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可坐在车中之股民,他们的不知所从与深受颠簸之苦与难言说?他们只能恨恨地说:政策市! (范大中)

秘密监督只是权力制约的补充

■热点纵论

一个被称作“隐性监督”的制度,在江苏泗洪县已推行了半年有余。去年7月,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了68名“特别监督员”,让他们对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随时向纪委举报。

(3月5日《新京报》)泗洪县纪委招募“特别监督员”,让他们监督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情况,出发点是好的,实际上也扩大了群众对官员的监督渠道。在肯定“隐性监督”尝试的同时,也需看

到,当前少数官员的腐败行为呈现越来越隐蔽的态势,而“秘密监督员”只能发现一些“看得见的腐败”,难以接触到重大腐败事件的核心。所以,“秘密监督员”的反腐作用必然是有限的。在我看来,预防腐败才是反腐取得更大实效的关键,换句话说,就是要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从制度上防范腐败。“隐性监督”尽管能发现一些腐败线索,但却很难在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上发挥作用。反腐斗争要取得更大成效与突破,离不开健全权力制约机制这一根本。 (魏文彪)

100多项房地产税费亟待清查

■公民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许家印4日披露了房价成本构成。其中提到:“房地产开发环节征收的各类税费高达100多项,其成本加起来占到房价的三分之一以上,最终也转嫁给了消费者。” (3月5日新华社电)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房地产开发环节征收的税费品种如此之多。近年来,有诸如许家印委员这样的有识之士一次次呐喊:一定要警惕中国楼市步入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泡沫危机之后尘,但这些呐喊似乎并未

激起社会的共鸣。

试想,若房价下降,赚惯了钱的房地产商洗手不干了,那这一百多项税费就没地方可收。所以,一些地方政府一直或明或暗地在托市。因为,自2004年起,地方政府每年可有上万亿的土地出让收入。

许家印委员的爆料再次提醒我们,要想房价彻底回归理性,就一定要从制度上逼迫一些地方政府尽快从楼市暴利泥沼中拔出腿来,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审计监察机构,全面审查抬高房价的这100多项税费,到底有多少是不合理的。

(周明华)

上海 精菜馆 SHANGHAI CUISINE

春季美食节 开幕

品上海 品味上海

全面接受团体聚餐/生日寿宴/婚庆喜宴

满十桌送一桌

美食节期间,无论消费多少 桌桌奉送精美大果篮

订餐电话: 83700077 83733737

地址: 广州路虎踞关1号(省武警总队斜对面)